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第10号 (2017年) 抜刷

我们为什么需要二字词?

——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序说

Why do we need disyllabic words?

Introduction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沈 国 威

SHEN Guowei

我们为什么需要二字词?

——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序说

沈 国 威

Why do we need disyllabic words?

Introduction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HEN Guowei

Abstract: The disyllabification of the lexicon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modern Chinese. The unification of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achieved up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carries out an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s of disyllabific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 It highlights how coordinative disyllabic compounds fulfill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syllabification,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possess an active meaning function.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of characters; disyllabic words, in turn, promoted the oral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Keywords: disyllabic words; unification of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一、小引

现代汉语是从19世纪以前的近代汉语发展而来的，现代汉语的形成在直至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完成过程中，其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词汇的二字化。¹⁾ 二字化不仅限于词汇的层面，同时作为横跨语法、文体的现象，赋予了汉语最明显的近代特征。词汇的二字化为汉语带来了下列根本性的变化：

1. 谓词体词得以实现词性转换；
2. 促进了词缀及类似成分的发达；
3. 二字形式动词“进行、给予、受到、开始、结束、引起、存在…”，介词“关于、对于…”的频繁使用改变了汉语传统的句子结构，促进了定语修饰部的复杂化；

1) 汉语史研究中多称“复音词”，词汇研究的专书、论文也称“双音词”或“双音节词”。本书除了引用外，使用“二字词”这一术语。因为在日语里，汉字和音节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同时，本文所讨论的二字词化问题也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其他语言所存在的现象，这正是标题中“我们”的意义所在。诚然现代汉语中，含有“-儿”的词虽然是二字，但表示一个音节。但这对本文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因为本文的考察对象主要是以抽象词汇为主的现代二字词。

4. 二字词形式为学术用语体系的建构准备了必要条件；²⁾
5. 二字词提供了大量同义词、近义词，提高了汉语的表达性和描写性；
6. 促成了言文一致的实现；³⁾

汉语词汇的二字化早在先秦已经初现端倪，晋唐的佛经翻译大大地促进了二字词的产生；始于16世纪末的耶稣会士翻译，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主导的宗教的，或者世俗的书籍的翻译以及汉外辞典的编纂，都催生了大量的二字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汉译日本书的影响下，二字词数量再次空前增长，最终奠定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基础。⁴⁾ 作为现代汉语主要特征的二字词，其发生的诱因、成词机制及形成的历史等都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前辈学者如王力、吕叔湘等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指出了词汇二字化的问题，50年代，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词汇二字化现象成为学术界的持续性的关注点，研究成果大量涌现。⁵⁾ 笔者近年的学术兴趣在于西学东渐背景下，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的国语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本文是从语言接触视角考察二字词问题一系列研究的序论。⁶⁾

二、汉语的进化与二字词

汉语为什么会发生词汇二字化现象？最常见的答案是词汇二字化符合汉语发展的大趋势。王力说“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音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⁷⁾ 这也就是说由一字词到二字词的变化是汉语“进化”的必然结果。19、20世纪之交是汉语二字词发生的一个高潮期，同时也是进化论学说在中国广泛流行的时期。人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力度的增加，新的事/物

2) 本文的“学术用语”与所谓的“科技术语”不完全相同。后者一般指科学技术的术语，即 term，而前者是指进行近代科学，人文的或自然的，叙述所需要的所有词语，包括动词和形容词。

3) 所谓“言文一致”，笔者认为其本质不是“我手写我口”，即将有声语言转换成文字，而是能够听懂的文章，即能将视觉映像转换成听觉映像的文章。

4) 现代汉语以二字词为主，二字词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商务印书馆，2008)中占总词汇量56,008词的72% (40,351词)，一字词仅为5.7% (3,181词)；为外国汉语学习者准备的词汇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改定版)》(国家汉办，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中占总词汇量8,822词的72.5% (6,400词)，一字词为21.9% (1,931词)；在《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国家标准)》(国家汉办，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中占总词汇量11,092词的75.6% (8,390词)，一字词为15.1% (1,675词)。不同的词表对一字词的认定标准不同，但作为总体倾向，笔者认为有失之过宽之嫌。根据笔者的统计，现代汉语中一字词的数量在1200左右(远远小于上述3个文献)，现代汉语中一字词可以看作一个稳定的常数，所以分母越大，一字词所占的比例也越小。

5) 近期专书管见所及就有伍宗文著《先秦汉语复音词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1)、程湘清著《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董秀芳著《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初版2002，修订本2011)等，研究论文更是数以百千计。朱庆之、梁晓虹等的汉译佛经译词研究中有相关章节讨论二字词的形成问题，如朱庆之著《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梁晓虹著《论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等。此外，在关于现代汉语形成、欧化语法的研究中词汇的二字化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6) 笔者的研究获得日本文科省以下资助，谨致谢忱。2010-2012年度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课题名：“中国語の近代「国語」への進化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欧化文法と日本語の影響を中心に”。2015-2017年度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课题名：“現代中国語への道程：語彙二字語化における外部誘因、特に日本語の影響に関する研究”。

7) 王力著《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340页。

的不断发生，人类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的逐步提高，知识积累出现了飞跃，语言作为人类活动的交际工具也需随之发展。以汉语而论，中国的社会进步要求汉语随之发生变化，反映到词汇上就是二字词的大量增加。总而言之，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语言也需要与时俱进。

最早从汉语进化的角度讨论二字词问题的是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博言科，师从日本国语学家上田万年，并且与章太炎有着师承关系的胡以鲁。⁸⁾ 胡以鲁回国后出版了一本被认为是第一部以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框架研究记述汉语的著作：《国语学草创》（1914）。《国语学草创》初印本几不流传，现在能看到的是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5月出版的重印本。刊登在《申报》上的广告辞称：

《国语学草创》：一册 四角五分 胡以鲁著 本书为日本帝国大文学士定海胡以鲁氏之遗著。胡君湛深语学，於二十年前首先讨论国语问题，实为国语书中第一部之创作。章大炎先生序文有“本之心术，比之调律，综之例证，证之常言，精微毕输，黄中通理”等语，推重甚至。惟坊间印本甚少，不易购得。版权自归本馆后，兹为第一次印行。研究中国语言学者不可不读此书。⁹⁾

从广告中可知，胡以鲁去世后其著作版权移至商务印书馆，由该馆重新出版。¹⁰⁾ 其实最早刊登该书消息的是北京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的“书报介绍”栏对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有如下详细介绍：

书凡十一篇。（1）论纲（2）说国语缘起。（3）国语缘起心理观。（一）说国语后天发展。（5）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6）国语成立之法则。（7）国语在语言学上之位置。（8）论方言及方音。（9）论标准语及标准读音。（10）论国语国文之关系。（11）论译名。“论译名”一篇，印书时未曾脱稿，别载癸丑甲寅间庸言报中。（？）胡君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专心研求各国古今语言文字，以为创造中华新国语之准备。不幸早世，致民国失一优秀人物，甚可惜也。是编所论，既不同于迂儒高远难行之说，尤非情钟势耀之流，专欲以北京方音为中华国语者，所可同年而语。书中要点，略具于章太炎先生之序中，今录如次。章氏曰“仰曾（胡君字）之言曰。中夏幅员辽阔，方语不能无小殊，犹南欧诸国同出罗匈，而言音往往别异，不失同归之道。所以发扬国语之长者曰。语言之成，无过‘综合’‘分析’二端。以综合成名者，希腊印度为最上。以分析成名者，惟中国为完备，西方英语亦近焉。故他国所云‘三性’，涉于宗教迷妄者，中国皆能郭清无余。其长一也。婴儿之语，先动词，复名词，盖客体先现而主观次之，有从此例以成排列者，其语言皆非进化者也。上世国语，亦有次第颠倒者，若云‘室于怒，市于色’，‘野于饮食’，汉魏已来，涤除殆尽，而他国皆不能比。其长二也。即音而存义者，地逾十度，时

8) 胡以鲁（1888~1917），字仰曾，浙江省宁波定海人，先在日本大学学习法政，获法学士学位；后入东京大学博言科攻语言学，获文学士学位；在日期间亦师从章炳麟。胡氏回国后，历任浙江高等学校教务长等教育行政方面的职务，1914年转入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课程，1917年英年早逝。

9) 《申报》第18107号，1923年7月25日。文中的“二十年前”应为“十年前”之误。

10) 最近又见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国语学草创》复刻版（2016）。时隔百余年，胡以鲁得以再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功德无量。当然复刻本如能有解题、导读一类则更好。关于《国语学草创》，另有关西大学博士，海晓芳的专著《文法草创期中国人的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可供参考。

越十世，其意难知也。即形而存义者，虽地隔胡越，时异古今，其文可诵也。夫夏人之性，以保守名，然语言文字，赖此形象不易，得以通达，翻译训故皆省焉。不齐而理。至繁而简。其长三也。若夫音以表言，言以达意，舍声音而为语言文字者，天下无有，宙合之文，皆谐声矣，虽中国固不能出此类例，是以六书旅陈，而谐声者什有七八。或云中国字皆象形，斯则诬妄之论已”又曰。“古之正音存于域中者，洋洋乎其惟江汉大鄂之风。其侵谈闭口音，宜取广东音补直这，异时经纬水陆之交凑于汉上，语音旁达，天下为公。今者考文正读，宜逆计是以为型范。斯余畴昔所持论，而仰曾亦有取焉。”观此所述，可以知是书之价值矣。

胡君又谓。“苟教育普及，一般知文词之适用，而大思想家大文豪如德意志加堆氏Goethe西来而氏Shiller其人者更起其间，以古语补今语之不足，以古语防外语之侵入，自成纯粹国民之文学，定言文一致之国语，此吾辈之所馨香祷祝者也。然是既不可旦暮遇，而谋教育之普及，又非从来国文所能奏其效。故吾辈权拟偶近于语音之‘质文’以应义务教育之实用。”因定“质文建设案。”略谓质文应用文字，约二千字已足，定以今义，及今义应属之词品，与今语一般之语法，编为教科书。凡繁缚之称呼，（如足下，阁下，执事，等。）无谓之区别，（如崩，薨，卒，不禄，等，）但取常用之一，而废其余。陈语古典，概废不用。实字虚字，皆取言文相近者用之，

国音之须制定，国语之须创造，皆今日至要之务。而于言文一致之先，制作近语之文，以为过渡时代之用，藉以驱除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毒焰，尤为刻不容缓之举。胡君此书，陈义甚正，大足供参考之资。¹¹⁾

推介文对胡氏的著作评价极高，最后两段更谈及胡氏著作在以言文一致为特点的新国语建构的进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如何建立新国语是当时《新青年》上学术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同一期上还刊登了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等论文，均为新国语问题的重要文献。推介文称胡以鲁“不幸早世”（原文如此），可知1917年5月1日前胡氏已经去世。不过1923年刊行的商务版中并没有第一篇“论纲”（只有章太炎的序言），商务版中作为附录所收的“论译名”在第一版刊行时也尚未完成。《新青年》之后，《大公报》也在1918年12月1日对胡著加以介绍：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胡君为章太炎先生高足，曾留学日本，通英德日三国文。是书本言语学原理，博征各国语言，上探我国古音韵及经小学源流，原原本本为我国学术界放一大异彩，为将来国语学者之光导。论者谓其书价值尤在马氏文通之上，洵不诬也。）¹²⁾

商务版《国语学草创》共147页，卷首有胡以鲁小照及章炳麟撰于1913年1月的序文，卷末附论文“论译名”，¹³⁾全书章节如下：

11) 《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另，所引章氏序言中的误植直接改正，不再一一注出。

12) 《大公报》0626号。标点为引用者所加。

13) 胡以鲁所著“论译名”登载在《庸言》杂志25、26合刊号（1914年第2卷1、2合刊号）。这篇论文反映了胡以鲁在《国语学草创》写作过程中的某些思索。参见沈国威《“译词”与“借词”：重读胡以鲁“论译名”》，《或问》第9号，2005年103-112页。

- 第一编 说国语缘起
- 第二编 国语缘起心理观
- 第三编 说国语后天发展
- 第四编 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
- 第五编 国语成立之法则
- 第六编 国语在语言学上之位置
- 第七编 论方言及方音
- 第八编 论标准语及标准音
- 第九编 论国语国文之关系
- [附] 论译名



在第一章“说国语缘起”，即汉语的起源中，胡以鲁认为汉语词汇源于“同一声类”，指出“吾国语大抵单节音也。意有余而音不足，故同一近似之语意，在字义有辨而语音同者甚多数也。”（25页）。对于汉语这种“先天”的不足，胡以鲁在这本9章125页的著作中专设两章，第3章“说国语后天发展”（51-58页）、第4章“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58-63页），讨论以词汇二字化为中心的汉语发展问题。以下根据笔者的理解，对这两章的内容加以整理综述。

胡以鲁指出：汉语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词汇在一字词和二字连绵词的范围内进行意义的引申和分化。一字词和二字连绵词的语音形式简单，区别性弱，造成了大量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古汉语尽管有利用变音、变调对词义、词性加以区别的方法，但终究极其不便。词义在扩大的过程中，暧昧不清的概念随之混入。在文学文字受到社会推崇的时代，意义上的暧昧能产生含蓄、浑厚的效果，故沿袭至今。汉语自古以来就有词汇不敷使用之虞。古代的文献中保存了很多已经废弃不用的词语，例如《尔雅》《释名》中30多个词被训成一个意思，《方言》中也有一个意思也对应十几个词的情况。这些词语很多其实是所谓古今和地域造成的同义词，而不是某一个共时状态下真有那么多个同义词，不过是文人把不同时代、地域的同义词汇集在一起而已。后人利用汉字的形体、偏旁等对词义的细微差别加以区分，形成了很多同音异义词（字），例如，刻玉是“琢”，刻竹就是“篆”，都读作 zhuàn；两性相好是“速”，相怨是“仇”，都读作 qiú；笨重迟缓的马是“笃”，厚重的物品是“竺”，都读作 dǔ。这样做，字形上的区别尽管十分明显，但是完全不存在语言形式（声音）上的区别。没有区别而勉强加以区别，这是少数人的行为，语言社会并不接受，造出来的词也就无法普及。胡以鲁指出这些词只是方言而不是方音，即汉字并没有反映出语音上的区别，字形的差别虽然很大，但终究不是语言原有的区别，所以不能得到语言社会的认同。

古汉语中同音异义、同义不同用法的词非常多，同音异义词的大量存在势必损口头语言的明晰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思想渐趋复杂，概念势必细分；事物多了，名称也就多了；科学进步了，术语也会增加。思想越复杂，表达思想的工具，即语言反而越要单纯（即由综合转向分析。笔者），语言成分的分工也越要彻底。要对概念进行区分，词汇的数量就要增加。语言如果不能精确地指示概念，就失去了作用；语言不能表达思想，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所以一方面要对词汇的概念加以界定，使之相互有所区别；另一方面需要新词应对新出现的概念。那么如何增加语词数量？胡以鲁指出，古汉语词汇量的增加“终不外乎单节之语词，仍有限也。”古汉语“单节之语音又有所限，斯同音异义之语多而闻者又虞淆惑矣。”“盖数不足还而求诸容量者，亦势也。”意即，由于汉语音节数不足，同音异义词就特别多，在口头表达上就有混

淆的可能性。要想进一步扩展词汇的数量，一字词是没有出路的，只能诉诸复音形式。古汉语中有很多双声叠韵的连绵词，虽然也是二字形式，但有先天性的缺陷：词义暧昧，¹⁴⁾ 不适用于非文学的语境。汉语需要用其他成分或方式构成二字词，而复合词就成了增加词汇种类、数量最有效的方法。所谓复合词就是词与词的结合，一字词意思不足时就添加其他成分予以补充，意义不确定时就加以界定。汉语有一个特点，即无词尾的形态变化，造词成分前接后续的结合比较自由，这种结合能够应对无限的意义概念。世界的语言中梵语最为丰富，汉语次之。梵语中所有的六种复合词构成方式（六合释 Shatsamasa），汉语都有。¹⁵⁾ 胡以鲁所说的“六合释”的内容和例词如下：

- (1) 带数释 Dvign, 即数词与实词结合而成的复合词：四海、十方
- (2) 有财释 Bahuvrhi, 以形容词作修饰成分的复合词，如以某种特点称呼其人的例子：苍头、方丈、近视
- (3) 限定释 Determinativ, 又称“依主释”，限定性的修饰成分和被修饰成分之间具有某种格的关系，但不需要使用前置词加以表示，如雪花的“雪”表示领属格；园丁的“园”表示方位格（住园之丁）；车夫的“车”表示宾格；
- (4) 重复法 Iterativ, 即重叠造词，用法广，意义也较多。如来来往往、风风雨雨、唯唯否否等。
- (5) 连置释 Kopulativ, 即“相违释”，以并列或对立的方式构成的复合词，前者有谿谷、典章、制度；后者有上下、尊卑、长短、轻重、缓急、存亡等。

胡以鲁没有谈及“邻近释 Avyayi-Bhava”，即以副词为修饰成分的复合词，“重复法”也不是六合释中的内容。¹⁶⁾ 关于重复法的作用，胡以鲁指出：汉语是“单节之语，语感 Sprachgefühl 有所不足，补是缺憾，乃延长其语音，或重复之以促相与语者之加意。故重复之法，见用尤多。”从胡以鲁提示的例词可知“重复法”只是语感上的改变，与实质性的词义增减无关。但是，胡以鲁对“连置释”做了颇为详尽的说明：

连置释中有并立对立二法，要皆复合二语为一语词也。并立者，合同义之语即所谓俚语者为一语词。有如“谿谷”广雅释为山。或合意义相近之二语为一语，别成一义。有如“典章”“制度”等。并立法亦然，¹⁷⁾ “上下”“尊卑”言序也。“长短”“轻重”言度量也。“缓急”言告急之时，“存亡”言将亡之际也。要皆复合二语为一语词，融和其义使之浑厚，或急遽其义使之强烈，以促对话者之加意，或融洽二者别成一义以补语词之效用耳。语词复合法，亦吾国语后天发展也。

胡氏在这里谈到了连置释的两种类型，即“并立”和“对立”。连置释又作“相违释”，“相违”顾名思义就

14) 双声叠韵的连绵词都属于拟声拟态词，即 onomatopoeia，二字浑然成一体，是非分析性的词汇成分。

15) 刘天行“漫谈声明并略论六合释与八啮声”（《海潮音》第16卷第12号1935年29-35页，古籍出版社复刻版749-755页）亦指出：中国文字可任意连缀数字成新名，自无变化形式，而在泰西文字则变化繁多，决不如是之简捷也。

16) 刘天行“漫谈声明并略论六合释与八啮声”中所示六合释内容如下：(1)相违释 (Duamdva)；(2)依主释 (Prtpurusa)；(3)持业释 (Karmrdhrrasa)；(4)带数释 (Dvigu)；(5)邻近释 (Avyayi-Bhava)；(6)有财释 (Bahuvrihi)。

17) 此处的“并立法”疑为“对立法”之误。



是不一致，典型的词例是“对立”型，言及事物或状态的两个极端，总括指称全体。¹⁸⁾ 对立型在造词上的功能有二，一是“复合二语为一语词，融和其义使之浑厚，或急遽其义使之强烈，以促对话者之加意”，二是“融洽二者别成一义以补语词之效用”。与此相比，“并立”型只是同义近义语素的重复，故与词义的增减、变化无关。胡以鲁说“‘谿谷’广雅释为山”，这似乎是胡氏的误解。如下图所示，《广雅》在“释山”一章里言及“谿谷”，但并不是把“谿谷”释为“山”。关于“谿”“谷”“谿谷”等的意义，《辞源》（商务印书馆，2016版）的解释是：

- 谿：山間的河溝。同“溪”。也作“磎”。說文作“谿”。廣雅 釋山作“谿”。左傳隱三年：“澗谿沼沚之毛。”注：“谿，亦澗也。”亦指無水的山溝。呂氏春秋 慎行：“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注：“有水曰澗，無水曰谿。”
- 谷：兩山間的夾道或流水道。詩 小雅 十月之交：“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 谿谷：山谷，溝壑。文選戰國 楚 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谷。”

“谿谷”不是“山”，而是山间的沟壑、河沟，与“谿”和“谷”意义相同，并没有“别成一义”。也就是说，并立型的复合词充其量可以“融和其义使之浑厚，或急遽其义使之强烈，以促对话者之加意”。只有对立型的复合词有可能“融洽二者，别成一义，以补语词之效用”。胡氏在此所做的论述显然是受到了荀子相关言论的影响。¹⁹⁾ 荀子在《正名》中言及事物命名方法时说：“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²⁰⁾ 荀子这段被认为是最早关于二字词的言说，前半部较好理解：对于相同的事物就给它们相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就给它们不同的名称。单音节的名称足以使人明白时，就用单音节的名称，单音节的名称不能使人明白时，就用双音节的名称。²¹⁾ 但是后两句则颇为费解，王先谦解释为：“谓单名、复名有不可相避者，则虽共同其名，谓若单名谓之马，虽万马同名，复名谓之白马亦然，虽共，不害于分别也。”²²⁾ 以白马也是马的逻辑来解释“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管见所及的现代汉语译注本则解释说：单音节名称和双音节名称不需要互相回避的，就用同一个名称，虽然用同一个名称，也没有什么损害。²³⁾ 按照字面这样的解释固然不能说是错，但终究令人感到似懂非懂，如五里雾中。荀子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情形？笔者毋宁做如下的理解：两个字义

18) 刘天行在其论文“漫谈声明并略论六合释与八啮声”中指出：(1)相违释：梵名“对偶”(Duamdva)，唐译“相违”，此释系集合各别之名以为一名，各名所诠事体不同，并皆联缀为一字，有“与”、“及”等义而无其缀字，例如“教观”，或如“天人”。教、观各别，天、人各异，皆合不相随顺之物以为一名是也。德语于此不同之二名须加连字，不能合成一字也。

例：海陆军，渔盐。

Gotter rmd mensscheu

19) 胡以鲁在本书卷末附录的“论译名”中三次引用荀子，详后。

20) 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8年418-419页。

21) 王先谦注：单，物之单名也。兼复名也。喻晓也。谓若止喻其物，则谓之马；喻其毛色，则谓之白马、黄马之比也（《荀子集解》418页）。“兼”，王先谦作“复”解，而有的注释本解释成“多音节”，笔者赞同王先谦说，认为应该解释为“复音”。事实也是如此，荀子所处的时代超过双音节的语词还极为稀少。

22) 《荀子集解》419页。

23) 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61-362页；黄建军译注《荀子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226-227页。

互相矛盾或对立的字，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中和，放在一起也不发生冲突，凝结成一个词也不会损害词义的确立。荀子在这里意识到的应该是“国家”“妻子”“市井”等对立型的复合词。荀子在接下来的段落中说：“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关于这句话，笔者也有不同的理解，²⁴⁾认为应该解释为：听到声音（能指）就能理解意义（所指），这是“词”的效用。将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即“丽语”叠加在一起可以构成新词。²⁵⁾“丽语”叠加构成的词，并没有意义上的动机，但是有调整韵律节奏、加强语意等的作用。只有知道了词作为语言单位的这两种性质，才能说是真正了解了“词”的本质。如果笔者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荀子在这里所说的实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二字复合词，第一种是“单不足以喻则兼”型，这里的“兼”完全是为了满足意义上的要求，即有意义上的动机，是为了命名新事物，或概念的精密描写；第二种是“累而成文，名之丽也”型，这种二字词没有意义上的动机，只是为了达到某种功能上的，例如调整音韵节奏、加强语意的作用。“不喻则兼”一类，在先秦文献中主要以偏正结构成词，如，淑女、良人、黄泉、天下、四海；也有一部分对立型的复合词，如，味爽、昧旦、左右等。²⁶⁾“累而成文”类绝大部分是同义并立型，也有少量对立并列型，前者如，朋友、道路、典章、制度、邦国、杀戮；后者如，国家、妻子、园圃等。已有的研究表明，战国前期复音词以偏正结构为主，中期后期以后联合结构后来居上。吕云生指出：“至迟到战国后期，并列复合词的数量已跃居各类复合词之首，到了东汉，它竟比其他复音词的全部总和还要多。”²⁷⁾程湘清也指出：“进入战国时期以后，联合式双音词的增长速度却比偏正式显著加快了。”²⁸⁾在《孟子》、《荀子》中联合式已经超过偏正式，显示出了强大的造词力。殷晓明的统计显示：《荀子》中联合式复音词共有767个，占全书复音词总数的51.93%。²⁹⁾李仕春根据先行研究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其结论是：复合词中的联合式和偏正式是最能产的两种构词方式，动宾式、主谓式、补充式、附加式、重叠式以及综合式是非能产的。联合式发展的总趋势是其能产性由远古时期次于偏正式到战国中期其能产性大于偏正式。³⁰⁾鲁六进一步指出：《荀子》复音词共有2,126个，其中联合式复音词1,043个，占全书复音词总数的49.1%，是《荀子》中最重要的复音词结构方式。³¹⁾胡以鲁也写道：

24) 王先谦注“名之用，本在于易知也。累名而成文辞，所以为名之华丽，诗、书之言皆是也。或曰：丽与丽同，配偶也。浅与深，俱不失其所，则为知名。”（《荀子集解》423页）前引现代汉语译注本译文为：“听到名称，就能知道它所代表的实际事物，这就是名称的作用。积累名称形成文章，这就是名称的配合使用。使用与配合使用都恰如其分，就叫做真正懂得了名称。”（黄建军，233页）“听到名称就能了解实物，这是名称的功用。积累连缀名称而形成文章，这是名称的配合。名称的功用、配合都得当，就叫做懂得名称。”（方勇、李波，366页）王先谦解释“文”为“文辞”，今人黄、方等解释为“文章”。《正名》中“文”字三出，都不作“文章”解，笔者倾向于理解为“文采”。丽通丽，也可作对偶、相配解，但不是译注本所示的词与词的配合（即句法层面的语词搭配），而应该是词的内部构成形式。

25) 即如胡以鲁所说“并立者，合同义之语即所谓丽语者为一语词”。

26) 《荀子》中还有“大小、动静、进退、出入、取舍、曲直”等。但如马真所说，有一些还停留在词组的阶段，不是结合紧密的复合词。参见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续）”，《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76-84页。

27) 吕云生“论汉语并列复合词形成的条件与原因”，《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4期8-11页。

28) 程湘清《汉语史专著复音词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89页。

29) 殷晓明“《荀子》中的联合式复音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95-97页。

30) 李仕春“从复音词数据看早期汉语各类复音词的发展趋势”，《烟台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15-18页。

31) 鲁六“《荀子》联合式复音词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162-165页。

汉书而下可勿论，即见诸左传者亦已多矣。如“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险阻，”“离散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此先秦纪传，吾辈所信为语言纪传者也。况是等语词，迄今固犹未尝死也。雅言社会上例中诸语词殆皆通用。即在通俗“婚姻”“兄弟”“同盟”“国家”“边疆”等体词，及“离散”“挠乱”等用词，亦皆用之殆不能有所代。其单语转且绝响矣。³²⁾

除胡氏所举“婚姻”等以外，文中的“甲冑、山川、跋履、踰越、险阻、倾覆、社稷、蝥贼、荡摇”等也是并列型复合词。而“国家”这种属于对立并列型的复合词在今天的词汇学中被称为“偏义复词”。所谓的“偏义复词”由意义上相对或相反两个成分构成，其中一个有实义，另一个没有实义，只提供语音形式，所以又称为“凑音节”。“妻子、存亡、园圃、动静”等在荀子的时代也已经具有偏义复词的用法了，魏晋以后的文献中词例更多，如，“巷陌、崩殂”等。偏义复词的形成是并列的语素之一在使用中意义逐渐弱化的结果。例如在“昼夜勤作息”（《孔雀东南飞》）中的“息”，在“缘溪行，忘路之远近”（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近”都没有实义；在“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李渔《芙蕖》）中既然是“观”，“耳”就无实义。但这些都是诗作中的情况，如果单独拿出来，就如胡以鲁所说能“融洽二者，别成一义”。“浅深、少长、生死、利害”等都可以找出类似的用法，这种用法固定下来就形成了偏义复词。

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的新词缀的发生，胡以鲁在第四章中对词缀问题也做了讨论。胡以鲁指出：有一些成分在复合词中意义虚化，即不再对复合词有意义上的贡献，只保留了调整音节，或者限定意义用法的作用。这一类成分“已流而为形式矣”，成了词缀性质的语言单位。胡氏认为，屈折型语言的形式部分有追求简单，融合成为语词中一部分的倾向，而汉语形式部分发生之途径在于“习为常套，流于乏意”，即字义的虚化。汉语形式部的发生动机是“欲求明了”，采用的是分化、附属的形式。胡以鲁指出“形式之界说虽为本义之消微及其原音之变化，然吾国语之本质，各语音独立不相侵越者也。故原音变化一项，不适用于吾国语之所谓形式也。”（58页）按照形态论的观点，实际意义的消失和语音的屈折性变化是形式部的定义，但是在这一点上，汉语与屈折型语言有所不同。³³⁾ 汉字具有视觉上的个体可识别性，既是听觉映像，也是视觉映像。有些构词成分在复合词中仍未丧失实质的意义，可以做逐字解，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复合词的结合紧密度。胡氏指出，尽管二字融合一体，别成一义，字的本义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汉字有很强的惰性，被编入复合词后，“虽流而为形式本意殆不复见。音声具在，勉自保持其名价，仍卓然自成一部耳。”所以胡以鲁称之为“部分上之形式”。（57页）胡氏说“此种发展，纪传中不概见，盖晚近事矣。”所举的例子是“-儿”和“-子”，而没有涉及当时大量来自日语的新词缀，胡以鲁甚至牵强地列举了德语的例子。³⁴⁾ 对于这种可以理解为词形复杂化的倾向，胡以鲁指出，虽然增加了音节，词形变得复杂了，但是概念有了分工，意义更明确了，这也是一种简单化。胡以鲁称之为“此心理上简明之要求与夫保守性之改良法，盖亦吾国语之自然进化也。”旧词缀早已失去了活力，新词缀则日益重要。胡以鲁敏感地

32) 胡以鲁认为：用不同的词表达不同的意思，固然是语言的发展方向，但是可以通用的还应该尽量简便地去使用。我们的国语并不希望繁琐。需要分析性的命名，古时狗有悬蹄的称作“犬”，没有长大的叫“狗”、深青色（乌白）叫“确”、霜雪的白叫“皃”、玉石的白叫“皃”等等，在我们看来都是方言的区别，是文人们在强辩概念。

33) 但是，某些屈折型语言也有屈折手段减少、派生复合手段增加的倾向，如英语。

34) 胡以鲁说“以小示昵近，德意志妇人小子多用 Chen, lein 等形式语其例也。”（58页）

捕捉到了汉语发展的新动向。

按照西方语言研究中关于复合词、派生词的定义，汉语中的派生词固然极为有限。但如果将所谓的“派生”理解为附加形式义，则是一种范畴化的手续，汉语自然也有独自的实现范畴化的方法。³⁵⁾ 汉语在二字词范围内，几乎不存在定位语素，这一特点，抑制了汉语使用者的词缀意识。关于词缀现象，胡以鲁反复强调“言其时世，惟形式附属不过晚近事。”汉语由于自身的特点“形式部分附属语所以少，而复合语所以特多也。”新词缀的发生是汉语近代化的显著标志。笔者认为，一方面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汉语本身的特质，只不过没有被激活而已。特别是三字词的增加，促进了词缀化的进展。笔者认为既然新词缀是在二字词化基础上发生的，考察的对象就应该限定在二字词以上的范围内。

胡以鲁指出“要之分担作用使概念分化为简单而明辨者，吾国语后天之发展也。然发展而仍不失其保守性，此形式部分附属语所以少，而复合语所以特多也。”又说“虽不无意义之可解，然而本义微矣。此晚近之发展，盖亦语言有就二节以上之倾向故也。今者二节语固甚普通，学术语词且有进向三节以上之倾矣。此欲求概念之明简而仍不能弃其保守性，直角方向之二力作用，所以向对角线进行也。”旧有的方法不足，就以创作新词的方法加以更替，这是人为淘汰的方法。但是语言是社会心理的产物，并非个人所能创造。只好修订旧词，让那些旧的语言材料分担新的职责。或者加上限定成分，规定适用的范围，或者扩展词义使概念明确而丰富。这些都是折中的方法。这就是词类划分以外，双音节复合词或附加词缀的方法得以采用的理由。现在双音节词已经非常普遍，学术用语还有向三音节发展的倾向。这是一方面要追求概念简明，另一方面又不能抛弃传统。就像直角方向的合力在对角线方向一样。

三、单纯词与合成词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做一些预备性考察。现在的词汇研究将词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合成词又分为复合词和派生词。根据索绪尔以后的语言理论，单纯词的形式和内容，其关系是任意的，即单纯词没有理据。质疑索绪尔这一原则的学者不在少数，但至少在其时层面上索绪尔是正确的。单纯词作为“能指”与“所指”建立听觉映像的关系，这一过程被称为“命名”。上古初民以综合方式为事/物命名，例如称四肢强健、善跑的力畜为 /ma/，汉字发生后记作“马”，不同的马又被称为“驹、骏、馭、驽、骠、骥……”等。³⁶⁾ 单纯词在命名之初或有某种理据，但这种理据只是命名者的感觉或印象，是非分析性的。就上面的例子而论，“好、快、小、美”等意义素都不可分割的融汇在一个音节里。这样的理据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逐渐磨损被遗忘。大量没有理据的事物之名势必加重记忆的负担，可以断定单纯词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是一个有限的量，并且已经达到了极限（饱和状态）。今天不管是哪种语言，都不能再创造单纯词（即词根创

35) 马真在前揭论文中指出“然、如、若、焉、尔”在先秦已经有词缀的用法。但仅限于动词和形容词。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续）”。郭锡良则列举了殷商卜辞中的元示、二示、三示、大示、小示；丘商、丘雷、丘绍；妇周、妇喜、妇多、妇康…等例。郭锡良“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高思曼、何乐士主编《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长沙：岳麓出版社，1994年51-71页

36) 初民用这种方式为周围所有个体命名，包括一草一木一石，“词”具有强烈的专有名词的性质。这或与初民的认知水平有关，但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个体名被归纳为相同的类，松树、柳树；小马、老马式的分析性手段更为普遍。

造)了。法国语言学家 A. 马丁内指出人类语言的本质性特点是双层切分，正是这一特点将人类语言与其他交际系统区分开。所谓“双层切分”是指语言可以切分为词，词可以切分为语素，语素又可以切分为一系列音位；人类语言只要有少量音位（通常不超过50个）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笔者是这样理解语言的双层切分的：人类的语言由数十个音位构成有限的音节单位，再由有限的音节构成近乎无限的音节连锁。音节及其连锁是词的物质形态；词是记忆的对象，所以尽管音节连锁的数量可以近乎无限（天文数字），但词必然是有限的；词构成句子，句子发展成篇章，句子是无限的。音节的结构和数量、音节连锁的心理长度，因语言而异。³⁷⁾ 现代日语只有110左右个音节，音节连锁的心理长度为2-4。³⁸⁾ 现代汉语加上声调音节数在1200左右，上古汉语应该不会多于这个数量，音节连锁的心理长度为2。汉语最重要的特点是音节单位与意义单位一一对应，联绵词、外来词都是少数。用1200左右的音节表示宇宙间的森罗万象，自然不敷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语一方面增大单位音节的信息负荷，即一形多义化，另一方面诉诸汉字的“视觉映像”功能维持意义体系（即同音异字、异词）。汉语借助汉字可以增加词量，这也是汉语一直采用的方法。“字”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不断孳乳繁衍的开放系统，历史上，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应对概念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收字不足一万，至清代《康熙字典》已超过四万。可以认为东汉时，汉语单纯词有一万以上（因为假借造成的同字异词）。但这是目治，听觉上的词应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汉语词汇的合成化尽管由于汉字的存在延缓了进程，但终是不可避免的。战国中期，汉语迎来了词汇合成化的第一次高潮。

汉语是孤立语，派生手段贫乏，词汇的合成化主要以二字词形式展现。和一字词相比，二字词有哪些不可替代的长处？首先，二字词可以提供一字词无法企及的数量级的词形供语言使用者选择。汉语语素的基本形式为单音节，在1200左右单音节的基础上要增加词语数量，或者一形多义，或者借助汉字的视觉映像，别无他法。而如上所述，这些方法在口语层面，最迟战国中期已经达到了极限，不得不另辟蹊径，即复音化。与单音节相比，1200个音节的双音自由组合，理论上可以得到100万以上的音节连锁，如果将三音节、四音节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数量将会更大。尽管实际上可实现的音形远远低于这个数量，但仍数十倍于单音节。加之汉字同音异形的作用，现实的文字串种类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二字词的出现为汉语的发展做出了以下的贡献：

一、二字词可以开示命名理据。理据的明示化便于词汇记忆，与人类语言从综合性向分析性发展的大趋势相符。

二、二字词可以对事物做精密描写，如马-白马；人-大人。缩小外延，扩大内涵，建构上下位意义体系。这同时也是人类认知发达的结果。

三、二字词可以对事物进行分类。单纯词没有理据，也无法分类事物。西方语言的派生词缀有分类的功能，但词缀数量有限，分类也就较粗糙。汉语则不同。上古汉语无论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都采用单音节形式，在形态变化不发达的汉语中，单音节是非分析性的语音单位，无缘分类。但汉语的词在获得记录形式，即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被加入了民俗分类上的考虑。例如汉字中的偏旁：木、鱼、虫、彳、讠、

37) 所谓心理长度是母语者平均感受的词长。超过这个长度，将被感觉为是一个合成单位。

38) 日语由于音节单位过少，进入平安时代（8世纪）后，多义现象造成单音节意义系统崩溃，故现代日语中单音节词（原生词汇，不含汉字等外来成分）极少。

金、石、足、口等已经对概念做了类别化的处理。固然偏旁是造字法，属于视觉映像，与有声语言无关，但是反映了初民对自然界，尤其是对植物界、动物界的民俗性理解和分类。在二文化过程中，封入汉字中的类别标记被释放出来，获得了语音形式。树根、树叶（葉）、树枝、鱼鳞、鱼鳍、鱼鳃、车轮、车轴、车辕；松树、柳树、榆树、鲫鱼、鲤鱼、鲸鱼、蝗虫、骏马、马驹等的下划线部分，在意义上是羡余成分，但是具有口语层面上的事物分类的功能。如前所述，二字词的分类现象在卜辞里已经存在，现代汉语词缀又在三字词、四字词中得到，或正在进一步发展。

正是由于有了二字词形式，我们才有可能为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概念命名。同时，单纯词无法开示理据，合成词中的复合词，除了联合式都有开示理据的功能，派生词则更有分门别类的功能。如胡以鲁所做的预测，现代汉语的派生词正在由二字向三字发展，词语将更具体系性。以上三项的二字词从构词法角度看，多为偏正式结构。

四、二字词可以提供同义近义异形词。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做一些特别说明。汉语的单纯词（联绵词、外来词除外）无一例外都具有“同形（音）异义词”，即一形（音）多义的特质。同形异义词是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的现象，但如果数量超过一定限度，将给语言的交流功能造成负面影响，汉语在这方面格外严重，以至于口头交流受到极大限制。二字词最大限度地解消了一字词同形异义的弱点。非但如此，二字词还具有以不同的词形表示相同，或相近词义的同义异形功能。笔者认为“同义异形词”这一貌似违反语言经济性原则的特点，其实反映了语言的“一物多名”的另一种本质。在汉语中，“同义异形词”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同义异长”，如“书-书籍；改-改变；学-学习；大-伟大、巨大、庞大”等。与一字词构成同义关系的二字词以联合式为主，并且“成群结队”，即构成一个同义词群。另一类是以同训异字为构词成分的复合词，如“改良、改善；伟大、巨大、宏大、洪大”等，这一类词也常常与一字单纯词构成等义关系。“同义异形词”对词汇体系并没有意义上的贡献，只是实现了词与词的区别。词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积极义，另一种是消极义。积极义可以命名事物，描写事物，消极义只是把一个词同另一个词区别开来。例如“改良”和“改善”是两个不同的词，尽管两个词的结构、意义都一样。不同的词可以提供不同的组合搭配，避免单调重复，从而有助于修辞功能的实现。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特殊的语境里，如法律的或某些专业领域的，所谓概念的区别是将日常语境里不需要区分的、相似的概念区分开来。如例如汉语只有“停车”一个概念，但是日语将同一事象按照驾驶员是否在车上，细分为“停车”和“驻车”，进行交通法规上的定义。外语教学理论中的 learning 学习 vs. acquisition 习得；mistake 错误 vs. error 偏误等也是如此。在导入其他意义体系中所存在的区别时尤其需要二字词发挥作用。

五、二字词有助于听觉辨识。汉语以单音节为基本，音形短小，羡余度低，不利于口头交流。索绪尔以后的语言理论认为有声语言是第一位的，有无文字的语言，但是没有无声的语言。人类为了记录有声语言，发明了文字，文字发生后，有声语言始被记录，这同时是一个有声语言被加工、精炼的过程，并以牺牲可复原性为代价。文字记录的不仅是有声语言本身，而且是知识的积累。这样，口语需要完成的任务就至少包括以下两项，一是信息交流，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二是知识的传递，后者只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针对特定的对象进行。前者的能力可以通过自然习得，后者需要长时期的有意识的培养训练，即学习。这种来自口语传播上的要求，长期以来形成了汉语使用者“用字成双”的韵律习惯，语词在搭配上

要受到来自音节数量上的限制。³⁹⁾

以上二项的二字词从构词法角度看，多为联合式结构。

四、内容抑或形式

让我们再回到胡以鲁对汉语二数字化现象的讨论。胡以鲁把二数字化称为汉语的后天发展，指出汉语先天性音节数有限，在“思想进于复杂”“事物多则名称繁，科学进则术语繁”的现实面前，二字词必然成为不二选择。这是胡以鲁对二字词发生的动机的解释。关于二字词化的原因，王力在上世纪50年代也曾指出“汉语的复音化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是语音的简化；第二是外语的吸收。”⁴⁰⁾即王力认为语音由繁变简，形式的示差力减弱，加之为了吸收外来的概念，此两者促成了词语的二数字化。但是胡云飏对王力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语音的简化”发生在唐末宋初，这甚至可以看成是二数字化（复音化）的结果，因为词形变长后，单音节的示差负担自然就降低了；战国中后期的二字词化高潮与吸收外语也并无直接关联。⁴¹⁾胡云飏将二数字化的原因分为内因与外因，所谓内因，即来自汉语本身的原因，具体是：(1)单纯的音节形式无法表达事物的复杂特征（理据开示）；(2)有限的单音节数量无法应对概念的增加；(3)单音节形式无法应对词义的多重化；(4)朴素的单音节词汇体系无法满足褒贬、雅俗等周边义的表达及修辞上的需要。胡云飏所说的外因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人际交流的扩大和思维能力的进步——对词汇体系提出的新要求。胡云飏的(3)其实是音节数量种类有限的必然归结，是结果而不是原因。(4)的问题核心也不在单音节这一形式本身，例如“杀-弑”、“食-啖”等在褒贬雅俗上的修辞性并不比二字词逊色，其字义甚至无法用二字词表达。其实，我们的设问可以改成，语言使用者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新词？研究者毫无例外说这是社会进步引起的概念增加和分化的结果。古汉语曾用变音变调等屈折性手段增加音节数量，但终于没有成为形态学上的手段，意义的引申派生成为主要方式，同形多义现象普遍。单音节的信息负荷量，在先秦已经达到临界点。虽然通过改变字形等视觉手段避免了意义体系的崩溃，但这是以损害口头表达的明晰性为代价的。古汉语有限的单音节数量不足以应对概念的日益增加及分化是二字词化的一个动机，但并不是全部，另一个动机是语言表达上的多样性要求。前者是语词的“内容”方面，后者是语词的“形式”方面。那么，作为二字词发生的动因，此二者孰轻孰重？对此既往的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概念的增加和分化的问题主要由偏正结构的词语来解决；而实现“修辞上的多样性”这一任务，主要由联合式词语完成。联合式词语的大量存在告诉我们：二字词的涌现不一定是新概念使然，事实上新概念的发生对于词汇的二数字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⁴²⁾如前引李仕春、殷晓明、鲁六等的研究所示，战国中期以后，联合式超过了偏正式，逐渐

39) 近年的研究显示，这种现象不但汉语有，日语、韩语、越语中也存在。

40) 王力著《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340页。王力还预测“将来实行拼音文字的时候，拼音文字也会成为汉语复音化的第三因素，因为复音化是减少同音词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可预见的将来，有无拼音化的可能性暂且不论，笔者认为拼音文字等书写层面的因素终究是第二位的。

41) 胡云飏“汉语词汇复音化原因的哲学探索——兼谈语音简化说和吸收外语词汇说的失误及语音简化的原因”，《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68-73页。

42) 联合式自不待言，偏正式，如前举，树根、树叶（叶）、树枝、鱼鳞、鱼鳍、鱼鳃、车轮、车轴、车辕；松树、柳树、榆树、鲫鱼、鲤鱼、蝗虫等，从发生上看，一字词在前，二字词在后，而概念并没有增加。

占到复音词的50%以上；现代汉语中联合式复合词则占20%以上，是最能产的形式。但如笔者反复强调，联合式只是同义近义语素的叠加，对语词意义的增减并无实质性的贡献。根据鲁六的统计，《荀子》中联合式复音词共有1043个，其中名词422个；动词325个；形容词278个。⁴³⁾ 名词暂且不论，动词、形容词的增加，并不完全是因为新动作、新状态、新性质的出现。那么，作为汉语词汇的重要特点之一的联合式，其存在意义又是什么？笔者认为联合式的贡献主要是：在不改变基本义的前提下，增加词汇量。调整韵律节奏等修辞目的很大程度上都依靠联合式实现。联合式提供形式，不提供内容，战国中期以后，新增词语的一半以上没有意义上的动机。由此可知，与内容相比，形式越来越重要了。这在近代以后，更加明显，笔者曾有专门讨论，此不赘述。⁴⁴⁾

我们为什么需要新词？就像某些人士永无休止地购置衣服一样，语言永远需要新词。衣服可以保暖，也可以保护皮肤，但这只是衣服功能的一个方面，衣服还有社会交际上的作用：显示身份、定义活动的空间等。词汇也是如此，一方面要表达概念，进行信息交换，另一方面要完成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如孔子所说，前者是“辞达而已矣”，后者是“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五、内因与外因

研究者在谈及语言变化时，常常将其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⁴⁵⁾ 也常常成为讨论语言嬗变原因的哲学箴言。什么是内因，什么是外因？胡以鲁指出汉语的变化缘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思想、科学的进步；胡运飏认为词形和词义的矛盾是内因，社会、交际和思维的发展是外因。这些代表性的主张认为：环绕语言的诸种因素从外部引发了语言内部的变化。语言既然是对自然界的切分与描写，不断反映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一切都是语言这一符号系统与生俱来的问题。但不同的语言对自然界的切分也不尽相同，不同语言互相接触时，会对语言的变化造成何种影响？特别是封闭的社会按照自身的节奏运动，语言的变化也与之相呼应，不同语言的接触能否改变其固有的节奏？笔者认为这种来自语言社会外部，即跨语言接触的因素才应该视作造成语言变化的外因。语言接触有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之别，但都以两种方式具现：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前者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既已有之，是为常态。如战争、边境贸易、异族通婚等，以社会生活中的信息、情感之交流为目的；后者以文字转换的形式实现，即翻译，主要目的是知识的传递。翻译是语言接触的高级形式，势必对语言产生持续性的影响。翻译的先决条件是书面语系统，日本古代与汉语接触时尚无书面语，翻译意识的确立相对滞后。⁴⁶⁾

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语言的内部因素，即认为二文化主要是汉语先秦以来历时变化的结果，个案的词

43) 鲁六“《荀子》联合式复音词研究”。

44) 沈国威“近代漢字訳語研究について：中国語からの視点”，沈国威、内田庆市编著《東アジア言語接触の研究》，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6年19-51页。

4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1，矛盾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02页。

46) 日本在解读汉文典籍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书面语系统。但首次明确指出中日文之间的翻译行为的是江户时代汉学家，获生徂徠(1666-1728)。氏说“和训即翻译”，提醒日本读者注意翻译过程中必然存在的“误解”。参见沈国威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二、新词创造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源考证成为主要研究模式，近期的研究也有着着眼于词组向复合词发展的词汇化视角的分析。⁴⁷⁾ 对于语言接触这一外部原因，关注点也停留在外部概念的导入上。如王力指出二字词化的“另一因素是外语的吸收”，⁴⁸⁾ 列举了音译词“葡萄、菩萨、罗汉”；意译词“火车、电话、发动机”等。王力的论述太过简略，容易被理解为用音译的形式吸收外来词，胡运颢就是在这一点质疑王力的。外来音译词并不一定经过文字的翻译，口岸城市的大量音译词就反映了这一事实。王力的“吸收”也并不准确，因为“吸收”常常意味着外来概念的接受，而如前所述，二字词一半以上与新概念无涉。笔者认为并不一定伴随概念转移的“语言接触”是更适当的术语。⁴⁹⁾

跨语言接触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其中“翻译”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二字词是书面语的成分，受翻译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在二字词化这一问题上，之所以要强调翻译，这种跨语言的接触之的重要性，是因为二字词产生的两次高潮都与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有关。第一次是佛经翻译，第二次是16世纪末耶稣会士开启的近代翻译。耶稣会士的翻译经由新教传教士、严复等本土译者，最终连接20世纪初的大规模的日书汉译。语言事实表明翻译是二字词产生的催化剂。除了汉语和汉语语言社会内部的因素外，我们还需要考虑跨语言接触对汉语的影响。

关于佛经译词，朱庆之、梁晓红等讨论了二字词化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注意。朱庆之在谈及汉译佛经对中古汉语的影响时指出，双音化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标志，具体有二，一、新的概念主要是由双音节形式来表示；二、原来由单音节词表示的旧有的概念大都有了双音节形式。⁵⁰⁾ 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耶稣会士，特别是19世纪以降近代翻译对汉语词汇影响的实际。即，一、新的概念用双音节词译出；二、为表示旧有概念的单音节词准备一个（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组）双音节形式。对于后者，笔者的研究称之为“单双互通”。“单双互通”既包括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术语为主的表示新概念的词语，也涵盖已有的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与佛经译词的研究相比，对汉译西书中的译词，及其给予汉语的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的词语至少没有成为近代汉语研究者的考察对象。⁵¹⁾ 记述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史，需要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将双音节化现象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加以考察，世纪之交的过渡期尤为重要。但纵观“近代汉语词汇研究”，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这一时间段的研究难免有缺位之感，近代词汇和现代词汇两种研究还处于某种断裂状态。

所谓“词汇化”就是词组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固化为复合词，其实现有两个条件，一是“紧邻共现”，二是“高频率使用”。“紧邻共现”就是两个造词成分经常一起出现，这样才有可能由松散的字串紧密结合成一个词；“高频率使用”是说某一文字串在文献中反复出现，逐渐被认知为一个复合词。然而作为现实，现代汉语中的二字词很多在20世纪之前的汉语文献中，或难觅踪影，或用例有限。也就是说，在传统文献中，即找不到“紧邻共现”，也观察不到“高频率使用”。

朱庆之指出，缘于语言本身原因的双音词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长时期的过程。佛经翻

47)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8) 王力《汉语史稿》，341页。王力的第一个原因是“语音的简化”。

49) 其实，王力明确意识到了翻译活动对汉语的影响。《汉语史稿》中分别有讨论佛经汉译和西书汉译的章节。

50) 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124页。

51) 耶稣会士的译述，尽管很多被收入了《四库全书》，成为传统学术体系的一部分，但在汉语研究领域并不被视作本土典籍。如《近代汉语词典》（2015，上海教育出版社）、《辞源》（2016年第3版，商务印书馆）等都不收录其中的词语。

译作为外因引起汉语词汇的变化用时以百年单位计，即便如此，朱仍认为佛经汉译起到了加速的作用。汉译西书的译词，与西方新概念的翻译，自耶稣会士起就逐渐积累，新教传教士又多有贡献，但传教士的翻译由于文体上的限制，二字词化并未最后完成。汉语二字词的急遽涌发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果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初步达成期，时间不过十数年而已。为什么二字词会出现这种剧增现象？笔者认为日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世纪以后的汉语近代译词研究，几乎一开始就同日语借词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尽管日语也使用汉字，但是日语终究是一种不同于汉语的外国语言，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事实是在19世纪末。这一点与有史以来一直以汉语为规范的日本知识分子完全不同。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不得不面对日语二字词大量涌入汉语的这一前所未有的事实。对于日语新词的大量涌入，当时就有一些人从社会语言学，如《盲人瞎马之新名词》（彭文祖，1915）、翻译术语学，如上文提及的胡以鲁的论文，以及余又荪的《日译学术名词沿革》（1935）等角度加以探讨。而作为词汇学上的考察对象进行系统地研究则是在50年代后期，讨论的内容也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术语为主。⁵²⁾ 80年代以后，关于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其出发点是近代西方新概念的引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汉语日语间的语词借贷。在这种主导思想下，研究者对日语译词新词的借用是如何填补了短时期内汉语词汇系统出现的空白表现了强烈的兴趣，而对于日语给予汉语词汇体系以及造词法上的影响似关心不够。对“改良、改善；伟大、简单、优秀、正确”等数以千计的双音词如何成为现代汉语基本词汇这一问题，无论是从事汉语词汇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的学者，都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日语影响的实质是什么？包括科技术语在内的日本近代译词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汉字二字词的形式。进入明治20年代（1886～）后，日本术语辞典的出版告一段落，术语体系的建构基本完成。大量汉字词形式术语的使用，给日本的文体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汉语的“单双互通”成为极好的对照，日语词汇体系的近代化是以“和汉相通”为标志的。即，一、新的概念主要用汉字词表示；二、以前的“和语”，⁵³⁾ 即日本的固有词汇获得了与之相对应的汉字词形式。“和汉相通”的汉字词主要是二字词。以动词、形容词为主的“和汉相通”的进程始于科技术语基本完成之后，完成于明治与大正的更替时期（1911年前后）。在时间上，日语的二字词化先于汉语一步，有了为汉语提供资源的可能性。

中日之间的语言接触，以及知识移动所伴随的词汇交流，对日语、汉语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笔者近年主张应将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分为三种类型：一、借形词、二、借义词、三、激活词。“借形词”就是词形借自日语的词，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哲学、义务、起点、神经、前提、团体、俱乐部”等抽象词汇；另一类是“取缔、打消、场所、场合、引渡”等日本原生词汇。后者主要是法律术语数量较少。借形词是日本人创造的新词，有的学者直接使用日本的术语：“和制汉语”。但是尽管是“和制”，在创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汉语资源（即命名理据）的问题，因为能够用汉字造词的人，对中国的典籍，及近代以降的汉译西书都有非常丰富的知识。

“借义词”是这样一类词：在词源上是汉语的固有词语，可以在中国典籍、佛教经典、禅宗语录、白话小说、善书中找到使用例，但是近代以后被日本的译者改造成译词，赋予了新的意义。如“革命、经济、

52)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41～63页。

53) 日本的固有词汇，又称“大和言叶”，或“在来语”，即日语在与汉语接触之前就存在的词语。

共和、民主、社会、关系、影响”等。

日语借形词和借义词被认为是日语借词的主要部分，也是迄今为止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些词的意义特征为抽象词汇、科学术语、新事物的名称。

“激活词”，或“日语激活词”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激活词作为词，或文字串在中国的典籍，或汉译西书中可以找到用例，在词义上，古今也有一贯性，即词源上并非“和制汉语”。但是，这些词突然活跃起来则是在19、20世纪之交。激活词有两种，一种如“望远镜、热带、寒带、细胞”等，作为译词是16世纪以后耶稣会士，或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创造的译词，但是这些词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直接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的一员，而是先传到日本，再从日本回流到中国。也就是说传教士们造的词和现代汉语之间有一个断层。另一种，如“学校、方案、改善、薄弱”等汉语的古典双音词，词类遍及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激活词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借形词和借义词。

“日语激活词”这一命名，意为在19世纪末为止的一段时期里使用频率不高，处于休眠状态的汉语词、结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文字串等，在日书汉译过程中，受到日语高频率使用的影响被激活了，并作为单音节词的对应形式，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

胡适在与朱经农讨论新国语特征时说：“我所主张的‘文学的国语’，即是中国今日比较的最普通的白话。这种国语的语法、文法，全用白话的语法、文法。但随时随地不妨采用文言里两音以上的字。这种规定——白话的文法，白话的文字，加入文言中可变为白话的文字——可不比‘精华’、‘糟粕’等等字样明白得多了吗？”⁵⁴⁾胡适的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双音化为言文一致的国语所必须，二、文言可以提供部分双音词的资源。现代汉语中有多少双音词来自文言，是中国的译者直接从文言中吸收的吗？对日语激活词的考察就是要回答这一问题。

六、小结

本文名为“汉语为什么需要二字词”，主要对二字词产生的原因、动机进行了讨论。关于二字词化的原因与动机，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 1、汉语单音节的数量种类不丰富；
- 2、概念的增加和细化；
- 3、事物命名由综合向分析转化；
- 4、追求多样化的修辞效果；
- 5、知识口头传递的明晰性需要；
- 6、汉语自身的韵律特点；

等等。在上面的章节中，我们对二字词发生的原因做了不同既往的说明。原因的诠释，并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回答现代汉语中如此大量的二字词是如何在短时期内获得的？当我们初步把主要原因锁定在日语词汇的影响时，如何证实就是不容推辞的责任。关于日语借形词，实际上是发现“紧邻共现”的事实，找出那些“从不连属”（樊增祥语）的新文字串。“哲学、前提、神经”等词在20世纪之前

54) 胡适与朱经农的“通信”，《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8.15。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的汉语本土文献中没有“紧邻共现”的实例，需要追寻到日语文献中。关于日语借义词，则需要仔细地辨别旧词在中外译书及同时代其他文献中的词义变化。传统的词源研究方法——发现首见书证、历时地共时地甄别词义变化，是有效的。

唯独对日语激活词的考察，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文字串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中，凝固成一个复合词，形态上固然有词义缩小、拒绝插入成分等特点，但关键是某一文字串，在限定的文本范围中出现频率的变化。在大规模语料库实用化之前，词语的频率调查几乎不可能。但是，近年迅速发展的语料库以及大数据研究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例如谷歌词频分析界面 Ngram (<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 可以调查某一时间段特定语词的使用频率变化。《申报》(1872-1949)、《大公报》(1902-1949)、《东方杂志》(1904-1948) 等语料库也可以调查19世纪中叶以后的语词使用情况，近期公开的“日语历史语料库”则提供了观察日语词频变化的工具。

笔者曾利用《申报》语料库对常用二字抽象词汇100词做过词频预备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词频上升的拐点集中在1904年以后。⁵⁵⁾ 笔者进一步利用“日语历史语料库”对其中的“改革、改善、改良、伟大、冷静、特殊、优秀、简单、正确”做了中日对比词频调查。⁵⁶⁾ 日语词频上升的拐点在1900前后，领先汉语5-10年，二者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相关关系。诚然，报刊媒体上双音词词频的增加有着复杂的因素，如，媒体字数总量、事件、新闻源、执笔者知识背景等，但随着语料库的逐步完善，尤其是日语历时语料库的扩大，我们可以得到更精确的检索结果，并从中了解中日二字词词频增加的时间差、考察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

近代词汇如何演进为现代词汇？19世纪以来的中外语言深度接触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讨论二语化现象时，这是一个我们绕不过去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二字词的增加是汉字文化圈其他语言，例如日语、韩语、越语等都可以观察到的“近代”语言现象，相关研究也需要横跨日语、汉语、韩语、越南语展开。

摘要：词汇的二字词化是现代汉语的显著特征。五四以后的言文一致就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本文对二字词化的动机进行了不同于此前研究的分析。指出，联合式二字词虽然不具备积极的意义功能，但是在二语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汉字知识普及的结果，二字词又反过来推动了知识的口头传递。

关键词：二字词 言文一致 联合式 偏义复词

55) Ngram 用于分析的语料性质、语料库的内部结构等都未公开，这也使我们不得不对调查结果有所保留。沈国威“中国語彙体系の近代化問題——二字語化現象と日本語の影響作用を中心として”，《周縁アプローチによ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とアーカイブスの構築》，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17年15～35页。

56) “改革、改善；伟大、冷静、特殊”是汉语古典词，“改良；优秀、简单、正确”在汉籍中均没有书证，可以断定为“和制汉语”。本文的目的不在中日词语的考源，在此暂不做过多涉及。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第 10 号

発行日 2017年3月31日
編集 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
研究科長 藤田 高夫
発行 © 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
〒564-8680 大阪府吹田市山手町3丁目3番35号
Eメール jeac@ml.kandai.jp
印刷 株式会社 遊文舎